

10 世纪前期归义军诸都僧统交替年代三题

魏睿鹜

一、贤照、福高的交替年份

贤照的继任者为福高，这一观点基本上已得到学界的公认，但两者的交替年份目前观点还不统一。竺沙雅章先生根据 P. 3556《都僧统汜福高和尚邈真赞并序》：“洎金山白帝，国举贤良，念和尚以（与）众不群，宠锡恩荣之秩，遂封内外都僧统之号，兼加河西佛法主之名”（郑炳林、郑怡楠辑释《敦煌碑铭赞辑释（增订本）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9年，第900页）。认为当张承奉建立西汉金山国时，福高继任为都僧统，他们两人的交替年份应在905年（〔日〕竺沙雅章《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》，京都：同朋舍，1982年，第348-349页）。荣新江先生则指出 S. 1604b《天复二年（902）四月廿八日都僧统贤照帖诸僧尼寺纲管徒众等》：“都僧统帖诸僧尼寺纲管徒众等。奉尚书处分，令诸寺礼忏不绝，每夜礼《大佛名经》壹卷，僧尼夏中则令勤加事业。……仰判官等每夜巡检，判官若怠慢公事，亦招科罚。其帖仰诸寺画时分付，不得违时者。天复二年四月廿八帖。都僧统贤照”（图版见方广锬、〔英〕吴芳思主编《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》第25册，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3年，第131-132页）。是目前所见贤照最晚的文献，遂将两人的交替年份定在902年（荣新江《归义军史研究——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284-285页）。郝春文先生亦持此观点（季羨林主编《敦煌学大辞典》，上海：上海辞书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355页）。看来要弄清两者的交替年份，还需其他文献来作进一步说明。

山东省博物馆藏敦煌文献 LB. 052 号文书中有关于都僧统贤照的记载，马德先生在《国内散藏敦煌遗书的调查随笔》一文中曾对这一篇文书进行过叙录：“正面为《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记》的疏释，背面有两件文献，一是《天复五年（905）新妇染患施舍文》（拟），二是《都僧统贤照都僧录谈广等上仆射状稿》（拟）。两份文献为我们提供了新的信息。一是天复五年，文书中写为‘天复五年甲子正月’。天复仅三年，即公元901年到903年。敦煌地处偏远，多有不知中原已经改元而沿用旧年号的情况。天复五年应为905年，而905年为乙丑年，甲子年是904年。此处干支与天复年次不合，推测可能是刚刚进入新年正月不久，出于习惯而仍记为甲子年，实应为乙丑905年正月”

(马德《国内散藏敦煌遗书的调查随笔》，《敦煌研究》2012年第5期，第48页)。并在文中根据《天复五年(905)新妇染患施舍文》与《都僧统贤照都僧录谈广等上仆射状稿》同抄一纸的情况，判断都僧统贤照905年正月还在任上。

另外，S. 2575 (3)《唐天复五年(905)八月灵图寺徒众上座义深等大行充寺主状并都僧统判辞》：“灵图寺徒众上座义深等状。众请大行充寺主。……伏望都僧统和尚仁恩详查，特赐拔擢。……天复五年八月日灵图寺徒众义深等牒。……状称多能，无羽能飞者。若阙六翻，岂可接云而高翔也。然来意难违，便可□□。□日。贤照”（图版见方广钊、[英]吴芳思主编《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》第45册，2017年，第71-72页）。此状由当寺上座领衔，徒众具名，请补寺主。判辞后有某位都僧统的署名，因文书末尾残缺，署名仅剩右半边部分，难以辨认。唐耕耦、张弓、郝春文等先生未予释录（唐耕耦、陆宏基《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》第4辑，北京：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，1990年，第51-52页；张弓《汉唐佛寺文化史》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367-368页；郝春文主编《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》第12卷，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370-371页）；王使臻先生录作“福高”（王使臻、王使璋、王惠月《敦煌所出唐宋书牘整理与研究》，成都：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，2016年，第170页）；郑炳林先生录作“贤照”（郑炳林、郑怡楠辑释《敦煌碑铭赞辑释（增订本）》，第899页）。S. 1604b《天复二年(902)四月廿八日都僧统贤照帖诸僧尼寺纲管徒众等》都僧统贤照署名清晰，将S. 2575 (3)中所剩右半部署名与S. 1606b对照，会发现两者实属一人，皆为都僧统贤照所署。可见，直到天复五年(905)八月贤照仍在都僧统任上，他与福高的交替年份应在此后不久。

二、933-935年间的都僧统

竺沙雅章先生指出，关于海晏的最晚一件文书是S. 6417《长兴二年(931)正月二十九日普光寺尼圆证等上都僧统状》，并认为龙晋是海晏之后的继任都僧统（[日]竺沙雅章《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》，第354-355页）。荣新江先生通过检索文书，认为P. 2638《清泰三年(936)六月沙州觐司教授福集等状》、P. 3302V (2)《儿郎伟》与海晏的卒年有关。P. 2638第9-10行记有已年(933)“阴僧统和尚衣物，唱得布玖阡叁拾贰尺”，荣新江先生认为这位933年去世的阴僧统非海晏莫属，并结合《儿郎伟》中的记载，进一步把海晏去世的时间限定在933年二月底以前（荣新江《归义军史研究——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》，第286-287页）。S. 6714《清泰二年(935)三月金光明寺徒众上座神威等上都僧统状并判》是目前所见最早记载龙晋为都僧统的文书，后有龙晋的判词：“上座是六纲主务，切籍众内能人。……准状补充，便须料事。九日龙晋”（图版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《英藏敦煌文献（汉文佛经以外部份）》第11卷，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94年，第63页）。933-935年间的都僧统为何人？

上引 P. 2638《清泰三年（936）六月沙州觀司教授福集等状》中有关于“王僧统”的记载：乙未年（935）“王僧统和尚衣物，唱得布陸阡叁佰捌拾貳尺”；回残项下：“又绵绫壹匹，王僧统袄子价入。”这位王僧统又见 S. 1519《辛亥年（951）十二月七日直岁法胜所破油面历》中：“面柒斗，油壹升，造故王僧统戒斋用。”935年他的衣服被唱卖，可知这位王僧统正去世于此年。荣新江先生由此认为王僧统是933-935年间的都僧统，但也不排除是这一阶段的副僧统（荣新江《归义军史研究——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》，第287页）。

正如荣新江先生所言，这位王僧统不能排除是这一时期的副僧统。有证据表明，这一时期其实是存在着一位都僧统的。莫高窟第387窟是一个盛唐窟，五代后唐清泰元年（934）由康家重修。西壁龕下有清泰元年十月修窟功德记。西壁龕下南侧五代供养人像列北向第一身题名：“……释门都僧统兼门□□□京城□□临□供奉大德阐扬三教大法师赐紫沙门□（香）□□（维）□（宥）供养俗姓康氏”（敦煌研究院编《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3年，第147页）。题名前虽前缺，然据学者们已有的研究成果，934年前并没有香号维宥，俗姓康氏的都僧统，郑炳林先生认为康维宥任都僧统当在清泰元年前后（郑炳林《唐五代敦煌的粟特人与佛教》，收入郑炳林主编《归义军史专题研究》，兰州：兰州大学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447页）。

康维宥任都僧统不会只任一年，他的任职时间应该在933-935年间。因此，这一时期任都僧统的应为康维宥，而非王僧统。王僧统去世于935年，他应该是这一时期的副僧统。

三、龙晋（辩）的继任者

竺沙雅章先生指出，有关龙晋任都僧统最晚的文书是 P. 4638（18）《清泰四年（937）僧龙晋等上司空牒》，认为龙晋任都僧统的年限止于937年（[日]竺沙雅章《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》，第355-356页）。荣新江先生则根据 S. 8583《天福八年（943）河西都僧统龙晋牒》，认为龙晋直到943年仍然在都僧统任上。另外根据 P. 2032V《甲辰年（944）净土寺直岁惠安手下诸色入历》：“粟陸硕，孔僧统亡百日斋餽入”；P. 2040V《乙巳年（945）正月二十七日己后净土寺胜净戒惠手下诸色入历》：“麦两硕五斗，孔僧统百日斋施入。粟貳拾硕，汜僧统施入”。认为这位“孔僧统”即为龙晋，进一步将龙晋的去世时间定在944年（荣新江《归义军史研究——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》，第289页）。

S. 3879《乾祐四年（951）河西都僧统帖》，是都僧统为常例转念限应有僧尼准时云集的帖，后有都僧统署名：“应管内外都僧统帖。请僧尼寺纲管所由等。右奉处分，今年四月大会，准常例转念三日，……右仰准此指搃，不得违犯者。乾祐四年四月四日。应管内外都僧统□□□”（图版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《英藏敦煌文献

(汉文佛经以外部份)》第5卷,1992年,第192-193页)。乾祐四年即后周广顺元年(951),竺沙雅章先生认为这位951年在位的都僧统即为龙晋的继任者,由于署名处过于潦草,未辨别出这位都僧统的法名,在文章中用“某”来代替([日]竺沙雅章《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》,第356页)。荣新江先生亦认为这位署名潦草的都僧统就是龙晋的后任,又据P.2040V《乙巳年(945)净土寺入历》中所载:“粟贰拾硕,汜僧统施入”,认为这位都僧统俗姓“汜”。在注文中又指出:“唐耕耦先生告知,他据北图新字号未刊文书,推定此名为‘光惠’”(荣新江《归义军史研究——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》,第297页)。最终得出结论,认为汜光惠乃龙晋的继任者。郑炳林先生将S.3879号文书都僧统署名处录作“全照”,并根据S.390《汜嗣宗和尚邈真赞并序》中所载,认为944年汜嗣宗曾继龙晋出任过都僧统一职,945年至951年间去世(郑炳林、郑怡楠辑释《敦煌碑铭赞辑释(增订本)》,第1160-1163页)。

正如学者们所言,S.3879都僧统署名处过于潦草,很难知道他的具体法号。唐耕耦先生指出的北图新字号未刊文书,经查阅应为BD14670(新0870)《灵图寺徒众举纲首牒及都僧统金光惠判词》:“□□□早夜不离于□□□于梵宇。……伏望都僧统和尚照详大业,允从众情,特补前人,以充纲首。……广顺三年四月日灵图寺徒众愿护等牒。……准请。勤能于须住持,便令勾当。不许有理者。二日。金光惠”(图版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编,任继愈主编《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》第131册,北京: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2010年,第310页)。BD14670都僧统署名处字迹清晰,方广锜先生将其录作“金光惠”(方广锜、李际宁、黄霞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·馆藏目录卷》第7册,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15年,第8029-8030页),土肥义和先生亦同意此录法([日]土肥义和《八世纪末期~十一世纪初期敦煌氏族人名集成(氏族人名篇 人名篇)》,东京:汲古书院,2015年,第844页)。广顺三年(953),距上述951年署名潦草的都僧统任职仅两年之隔。另外,如将S.3879与BD14670号文书都僧统处署名进行对比,则会发现两者实属一人,均为金光惠,而非汜光惠。

目前所见金光惠任都僧统最早的文书为S.3879《乾祐四年(951)河西都僧统帖》,据荣新江先生研究,龙晋于944年就已去世。那么944至951年间是否有可能存在另外一位都僧统?上文,郑炳林先生根据S.390《汜嗣宗和尚邈真赞并序》中的记载,认为944年汜嗣宗曾继龙晋出任都僧统一职。S.390《汜嗣宗和尚邈真赞并序》:“师姓汜氏,香号嗣宗;济北名家,敦煌鼎族。……可谓河陇仁师,殊方教主。方保长隆圣教,永曜慈云。……继恩叨承门吏,幸忝周勤;……法门梁栋折,儒苑艺皆空。……”(郑炳林、郑怡楠辑释《敦煌碑铭赞辑释(增订本)》,第1160页)该篇邈真赞无篇额、撰写人署名及撰写题记,据序文:“继恩叨承门吏,幸忝周勤”,继恩,即杨继恩,乃本篇作者。敦煌文书中杨继恩的作品保存较多,统共有九篇,从撰写题记看,杨继恩的作品上起937年,下迄946年,以此推之,本篇邈真赞当撰于937-946年之间,或距此不远,从时间上看,汜嗣宗正处于这一交替阶段。郑炳林先生的这一观点

还可从 P. 2032V 《后晋时代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》：“粟六斗沽酒，汜僧统开经时看僧官用”，“粟肆斗沽酒，汜僧统开经罢日解劳荣斋人用”；P. 2040V 《乙巳年（945）正月二十七日已后净土寺胜净戒惠手下诸色入历》：“麦两硕五斗，孔僧统百日斋施入。粟贰拾硕，汜僧统施入”，“粟贰拾硕，汜僧统依忸子施入”，“麦贰拾硕，汜僧统施入”；P. 3165V 《年代不明（公元十世纪）某寺入破历算会牒残卷》：“一石二斗僧统亡纳赠用，……四斗看汜僧统用”等文书中得到佐证。这位汜僧统是继龙晋后的僧统，这一时期俗姓汜的僧统当即汜嗣宗无疑。如此，则 S. 390 《汜嗣宗和尚邈真赞并序》的撰写时间最有可能应在 946 年。

这一时期的文书中还有一位吴僧统。P. 3234V 《面豆布縠入破历》：“立机一匹，吴僧统患令诵施入”；S. 6300 《年代不明（公元十世纪）诸色斛斗入破历算会牒残卷》：“油半升，粟壹斗，岁日祭嚮吴僧统用”；P. 2032V 《后晋时代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》第 309 行：“吴僧统和尚收灰骨人事用”、第 817-818 行：“面壹硕叁斗伍升，吴僧统和尚收灰骨造顿用”；P. 2040V 《后晋时期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》第 108-109 行：“立机壹匹，土布壹匹，吴僧统患时念诵入”、第 295-296 行：“油肆升，吴僧统收灰骨造顿用”。从时间上来看，这位吴姓僧统正处于龙晋和汜嗣宗任都僧统期间，荣新江先生认为他或许是龙晋时的副僧统（荣新江《归义军史研究——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》，第 297 页注 [71]）。

944 年龙晋去世后，接替他任都僧统的并非“某”或“汜光惠”，而是汜嗣宗。汜嗣宗任职时间是在 944-946 年之间。946 年后，由金光惠继任都僧统一职，直到 953 年，他仍在任上。这一时期敦煌文书中所出现的吴姓僧统，应该是龙晋时期的副僧统。

（作者魏睿鹜，1994 年生，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）